

「大陸新娘」的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

陳淑芬

——兼論服務是共有的「大陸新娘」的段段及其對服務是共有的影響

壹、前言

「大陸新娘」(註一)儼然成為國內婦女保護機構服務的主要族群之一，其特殊的身分認定及公民權規定使婦保機構在服務的過程中涉及不同的人權議題與行政機關(如陸委會、境管局等)；不論就學術或實務價值，「大陸新娘」受虐議題的特殊性不言而喻。而國內對婚姻暴力現象的研究雖不少，卻尚乏針對此一族群的研究，因此善牧基金會於九〇年十月至九一年七月針對其庇護安置的「大陸新娘」進行研究；本文為該研究的成果之一。本文從我所訪談的七名「大陸

新娘」(均接受善牧基金會的服務)的訪談資料為基礎，探究「大陸新娘」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的相關議題及婚姻暴力中(兩性)權力不平等的本質及其展現形式。

有關兩岸婚姻的各種規定及「大陸新娘」的身分與公民權的認定無可避免地受到國家安全及兩岸政治暨歷史關係考量的高度影響，涉外婚姻比例日高的現象又不能不放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趨勢下來理解，常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語言的使用形成對「大陸新娘」的界定、假設與印象，這些看法較屬於負面的。而對受婚姻暴力的「大陸新娘」提供服務的主要人員——社工員、警察、司法人員、境管局人員等——也都是常民之一，不免受到上述假定與看法的影響或複製類似的看

法。本文的另一個目的是兼論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是如何不知不覺地在影響這些服務提供者(註二)；以及身為社工員的我們如何避免這些影響。

貳、「大陸新娘」的擇偶、結婚歷程與婚姻生活

一、「大陸新娘」的擇偶與結婚歷程

「大陸新娘」的身分形成，正如其名詞所示，是因為與臺灣男性結婚所致，因此理解她們的擇偶與結婚歷程是很重要的(註

三)。從七名「大陸新娘」的言談中，她們與臺灣配偶的認識方式及結婚歷程可分成三種：經人介紹短時間內結婚、自由戀愛、嫁給遠親。其擇偶因素因而有不同的考量；來臺灣的過程也不盡相同。

經人介紹短時間內結婚

受訪者B、F、G都是經人介紹短時間內結婚，她們較著眼於臺灣配偶可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或可以到臺灣來生活。受訪者B很直接地說：「我只是想為全家犧牲，金錢第一」。她嫁給大她年紀甚多的丈夫主要是因為金錢的因素、較佳的物質生活（她的丈夫在大陸的鎮上有自己的房子）及信服堂姊的勸說。受訪者F是經朋友介紹與丈夫通信、傳真約二個月後結婚，對於結婚的動機她也是直言不諱：「沒有錯，我結婚是想要來臺灣生活」。受訪者G已喪偶多年，獨力照顧公婆和孩子，後來因為孩子成年且公婆去世，子女贊成她晚年再找個伴一起生活，在鄰居介紹、拜託下，再加上她也「想到臺灣來玩、見識見識」，因此決定嫁給她的丈夫。

自由戀愛

受訪者中有三位是自由戀愛結婚的，她們提到的擇偶條件包括學歷相當、熱烈的追求方式（即「愛」的表示）、體貼、薪水高等等，和目前臺灣社會認可的擇偶條件很類似。有一位受訪者特別強調學歷相當的重要性，她認為相似的教育程度在生活環境及經驗上可能較類似。三位受訪者都提到丈夫特殊的追求方式令她們感動，而正是這樣的情感因素、愛的感覺讓她們接受對方的追求。受訪者A說：

我的先生：很多方面他很關心我，照顧我，有時候我下了課他會在門口等我，買個麵包啦，那時我的感覺是沒見過這樣的人，因為當時同年齡的男生大家都是同學，大大刺刺的，不會像他這樣這麼費盡心機的，晚上不管多晚都會來寢房找。我們學校男生追女生最常見的就是每次學校舞會時的第一支舞，男生會趁這時候接近女生，還有就是中午吃飯的時間，他會在飯廳等她，幫她買飯、拿開水、送回宿舍，但我丈夫他的表現方式是不一樣的，有點挺新鮮的。後來交往兩三個月以後，我慢慢知道他是臺灣人，那時感

覺個性不太合得來，有一天我就告訴他別來找我了，他表現的樣子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我要是再說一句挽留你的話，我就不是男人。我那時覺得他好有個性，好像瓊瑤裡面的秦漢，我本來就很迷瓊瑤，但我當時還是鐵了心，不想和他交往了，結果他跑到門外來抱著我哭，那時我徹底被感動了，從來沒有一個男孩子對我這樣，哭得稀哩嘩啦的，一個大男人，他又一百八十幾公分，這樣哭。然後加上他說他在臺灣事業失敗，連女朋友也離開他，每個人都是向他要錢，只有我是那麼脫俗的，也算是好聽話，說我也是視錢財如糞土，如果我也離開他，那也是愛錢；我那時候：以為他是一個身窮但志不窮的男朋友，那時他說要回臺灣好好打拼，說得你不跟他回來好像不行，你一定會後悔一輩子：

受訪者A談到她丈夫的追求方式與其他人不同，對她來講很新鮮，因此引起她的注意；另外受訪者受到瓊瑤浪漫小說的影響，對於丈夫的言行解釋成「與眾不同」、「有個性」、「人窮志不窮」的形象而深受感動。

受訪者D強調丈夫的體貼令她感動，受訪者談到十年前的往事，雖然是都是一些小事，仍可以體見受訪者當初的感動。

以前他曾經很體貼，一個小水溝、或是路上泥濘、他就背著我，一路走回去，讓我很真的很感動。在大陸時有一次，眼睛有點怪怪的，他就說去醫院去醫院，我覺得沒什麼嚴重的，可是他就說去醫院去醫院，就是很堅持送我去醫院，讓我很感動：：（受訪者D）

那時候覺得他很大方，非常體貼，幫我洗頭，好有面子：那時就是愛情：他那時真的，在大陸，早上的時候零下三〇度，很冷，他一大早就起來，屋子裡的火爐升起來，熱水煮好，飯也煮好，每個人起床的時候都有熱水可以洗臉，然後幫你盛飯，每天都是這樣，還會煮宵夜，那時候真的是很感動：：（受訪者D）

受訪者E除了提到丈夫經濟因素外，丈夫鍥而不捨的追求方式（到不同省分找她），使受訪者感到他的誠意，受訪者的話語中也可以感覺到這位臺灣配偶口才不差，現在受訪者用「花言巧語」來形容（註四）；而有一

次丈夫哭泣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訪者認為他很重情意，大受感動。

情感因素在自由戀愛的婚姻中的確占相當的重要性；弔詭的是，就像這些受訪者談的「故事」形式一樣，情感與感動常與情境習習相關（因此不是永恆不變的），我們在稍後會看到這些多情的男子竟都變成婚姻暴力的加害人。

嫁給遠親

訪談的對象中有一位是嫁給遠親，這位受訪者的結婚動機是為了報恩（夫家曾在經濟上協助她的娘家）、丈夫對她好、及考慮夫家家庭單純的因素（配偶的姊妹都已出嫁）。這些考量因素並不陌生，且大致來說為一般的臺灣人所接受。和「經人介紹短時間內結婚」的類型相比，這位受訪者較重視情感因素；和「自由戀愛」的類型相比，則較傳統，以未來生活安定為主要考量。

雖然我訪問的「大陸新娘」人數不多，不過，以上三種類型的婚姻各有不同的擇偶考量，只有第一類型是比較「功利型」的，其他兩者則頗重情感因素；這和一般人對兩

岸婚姻是「功利婚姻」或「大陸新娘」是「假結婚真打工」的刻板印象不完全相符。

至於這些「大陸新娘」的娘家對女兒嫁給臺灣人的看法如何？訪談的資料顯示，受訪者A、B、D、E的娘家都反對她們嫁給臺灣配偶，反對的原因主要是臺灣與大陸的空間距離遙遠、對臺灣印象不好、對女婿不滿意（如年齡太大、「看不順眼」、「眼神兇」、「不是好人」等（註五）。受訪者C是為了報答丈夫的恩情而結婚，因而娘家的態度是贊成的；受訪者F、G則都是第二次婚姻，她們的年紀也較大，娘家的態度在決定婚姻上並不重要。

一、「大陸新娘」的婚姻生活與適應

我們在擇偶的部分曾看到有兩位受訪者是因為想到臺灣來而嫁給臺灣人，訪談資料顯示，有三位受訪者並不是計畫來臺生活的，她們是基於不同情況及原因來到臺灣，有因為來臺度假卻因懷孕而留下來的，有因

為生第二胎躲避大陸的罰款而來臺灣的，也有因為小孩戶籍而來的（註六）。在對婚姻生活的期待上，有四位受訪者談到這個部分，她們的期待主要都是過著平穩的婚姻生活（註七），而不強調特別的物質享受。

「大陸新娘」因為婚前沒有來臺灣的機會，對未來將生活的環境、尤其是婆家的了解甚少，從擇偶到結婚，前面敘述裡只有一位考量到「婆家」的因素，上述對婚姻的期待也多是限於夫妻兩人關係下的。訪談發現，「大陸新娘」到臺灣來有許多適應的問題，除了夫妻兩人的關係外，尚有與婆家相處、生活環境、習慣與文化差異等問題。

「大陸新娘」來臺灣生活常會有與期待落差的適應問題，而一個主要的問題常是丈夫誇大自己的物質條件或隱瞞許多個人的不當習性。

生活環境或條件期待的落差

生活環境與期待不同是很明顯可以感覺出來的，期待的落差容易造成失落感及適應的問題。如受訪者A發現夫家的生活條件好像是她娘家二十多年前的情況（包括房子

很舊、環境不好、交通不便等）；受訪者E的丈夫告訴她他有「自己的房子」，結果她來到臺灣發現是「有自己的房間」；受訪者F發現丈夫是「窮光蛋」。這些落差和失望的背後常是更深層的受騙的感覺。

與婆家同住及相處問題

與婆家生活對大部分的婚姻生活都是一大挑戰，因為生活習慣的問題、相互角色期待等，對「大陸新娘」更是如此，因為可能還包含文化、語言差異的問題。受訪者C就提到與婆婆語言不通的問題。受訪者E很不習慣的是家中所有事由婆婆當家做主（註八）；衝突和不適應也可以小到和菜名有關（註九）；受訪者A的例子則帶出生活階層及生活經驗完全相異的適應問題（註十）。

被欺騙

來臺灣後再加上共同生活，這些「大陸新娘」有機會重新檢視這些臺灣配偶的條件、特質、過去經驗、行為等等，而因為許多臺籍丈夫在大陸時不實的說明或有意隱瞞部分事實，「大陸新娘」常發現自己受騙了！如受訪者A婚後才知道她的配偶是小學畢業

（她丈夫原稱他是專科畢業，而受訪者A本身為大學畢業）、好賭又吸毒。受訪者C亦發現丈夫長年吸毒；受訪者B因「要辦身分證，去申請戶籍謄本，才看到他結婚四次」。

不只是生活環境糟一點或房子小一點而已，學歷、結婚次數，甚至吸毒、嗜賭等不良習性等的確是關於個人的重要訊息，可以想像這些「大陸新娘」發現時的震驚。尤其這些因素都和擇偶有相當大的關係，這些「大陸新娘」會發現她們當初要嫁的人跟實際上嫁的這個人可能完全不同。現代婚姻的兩個要素是信任與坦誠，從這些「大陸新娘」的陳述中，我們發現這些兩岸婚姻的基礎薄弱；臺灣配偶的隱瞞或欺騙相對於「大陸新娘」的無從查證意味著兩性關係中臺灣配偶的主導權與控制權，加上「隨夫居」的婚後居住法則（「大陸新娘」必須離開她熟悉的環境到完全不熟悉的臺灣來生活、兩人關係中隱含的權力不平等與控制面向早就在婚姻關係開始前就已悄悄扎根。

參、「大陸新娘」的受虐歷程。

婚姻暴力的多種面貌

國內對婚姻暴力的研究早期多側重於身體的傷害與虐待（周月清，一九九五：廿七）。隨著婚姻暴力的日漸受到重視及女性主義觀點的影響，近年的研究已將言語、情緒虐待和性虐待納入虐待的定義與類型中，如陳婷蕙（一九九七）、林佩瑾（一九九七）等均是。暴力的結果不只是講求「有證據」的肢體傷害（有時也包括性虐待），而更應重視那些「看不見」但對當事人來講卻是「感覺真實」的情緒、精神及性虐待。誠如林佩瑾（一九九七：二〇）所言，將婚姻暴力的定義限於肢體暴力不僅扭曲問題的全貌，更降低了問題的嚴重性。本文對「虐待」的界定亦採此一取向，將虐待定義為一個人控制另外一人的行為，包括身體上、精神上或情緒上、言語上等（周月清，一九九五：十九）。虐待的重點不是傷害行為的有無（如丈夫是否打了妻子），而是這些行為的「控制」面向，即不論是肢體、情緒或性虐待隱含的兩者間權力不平衡及一方透過這些虐待行為造成對

另一方的控制與削權。本文從七名「大陸新娘」的訪談資料整理出施虐者對受虐者的權力施展及控制有下列多種展現形式。

一、毆打

毆打是很常見的暴力形式，毆打直接造成身體的傷害及痛感，讓人最容易從外觀上感覺到暴力的存在。本研究的七名受訪者均有受到肢體暴力，以下舉幾個不同的例子。

受訪者C、G的丈夫是為了錢打妻子：

如果先生幫忙一點，一起做生意，一天可以賺個二〇〇〇元，二個人一起做，負擔房租、生活費什麼的就夠。可是他不是，他不要一起做，而且吃喝嫖賭通通來，有時幾天不回家，回來就是要錢，什麼都要聽他的，我拼命做，他開口要錢，我不給他他就動手：。（受訪者C）

他這個心太狠啦：他找我要錢，要二十萬，我說我那有二十萬給你，我的錢都在你那個地方：最後要二萬：我沒有二萬：就不行啦，就開始打：第三天都動不了了：身上

都黑青了，前胸、後背：。（受訪者G）

受訪者C、G的丈夫將毆打當做妻子不回應其要求的懲罰手段；受訪者C這裡提到的「什麼都要聽他的」的特質讓我們看到「控制」的暴力本質，而讓妻子體會到施虐者權力在握的方法就是不聽他的就被毆打—讓受虐者感到身體的傷痛；這亦顯示施暴者—受暴者間權力的極度不平等。受訪者D的丈夫毆妻則沒有明確的理由：

我先生就是主動找你吵架，鬧起門來：會打，他一六八，很壯，打了我就倒了，他還說要把你打死，打死了就有名望，這是在調教，要一天一頓打：。（受訪者D）

受訪者D的丈夫毆打妻子不需要理由，且把它當做是「調教」，顯然暴力已有一段時間，並暗示毆妻是正當的、可以有規律的行動，這類無理由的暴力通常也較難預防。受訪者E在訪談時談到最近一次受暴經驗，令人感受到她遭到非人的對待及當時受暴的嚴重程度，請看下面的例子。

又被打，而且是骨頭打斷掉：他不是用手打，他是用東西打：他用那個瓷杯，用力

敲我的頭，頭都已經縫了三條，還兩條沒縫，那手是這個骨頭已經斷掉，我當時我真的是喔：「頭部」那個血一直在沖了耶，很可怕，而且那個血是大量的沖，：當時我就是：他：我就是看到血在沖的時候他就去拿毛巾洗，去洗手間拿毛巾，我就趕快報警，他看到我報警衝過來把我電話一搶，搶掉之後那我就沒辦法報啦！那我剛好也快講完了，警察又打電話到我手機上面，他又不接了。等到：等到我把那個門打開跑到門外面，他又把我拖進來，我就躺成那個直的，就是讓他拖不進來就對了，就橫在那個門口躺著，拖不進來，那所以：他那时候就穿鞋子，我就趕快往下衝，往樓下跑，樓下老闆看到我這樣子就馬上報警啊！叫計程車。我老公跟在我後面追下去喔：對，最嚴重的一次。之前是沒那麼嚴重，可是也是打得有點嚴重：至少沒有說流血用沖的，因為打到頭，那個血，很恐怖耶！整個衣服都是血淋淋的，整個眼睛、整個脖子，整個都是血，那頭髮裡面洗了好幾次才洗乾淨，都是那個血粉，乾掉的血粉啊！蠻可怕的。當時剛去醫院的時候他

說這個手沒有斷掉啊！結果等到十多天那個手還是這個樣子，很奇怪，就是腫腫的，因為沒消腫，又是麻木的，一直都沒好轉，那結果等到十多天我去其他醫院一照，它斷掉了。那當時我實在受不了，因為他說要開一次刀，ㄟ，我都快昏了：就是這個部位，他就拼命敲，拼命敲，一敲的時候我那兩個眼珠前面就金光閃閃，我就用手去抱住頭，所以手才敲斷掉，就敲到頭很痛受不了了我就用手去抱著頭，就給他敲手才沒那麼痛，敲頭比較痛，就把這個手骨敲斷掉。之前這邊也是敲到腫起來淤青：（受訪者E）

受訪者E的描述令人如臨現場、觸目驚心，受訪者在描述時也仍是心有餘悸。在這裡我們看到施暴者並沒有因為妻子嚴重受傷而將她送醫，反而是阻止她報警、要將她拖進門等想阻止妻子求助或阻止事件外洩於家戶之外的做法，施暴者似乎有「家戶」內是他可控制、管理、權力可及之場域的想法。

一、扣留證件以限制自由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大陸新娘」在臺灣居留有一定的日數規定，且大陸人士在臺灣可能遇到警察人員的臨檢盤查，許多臺灣配偶為掌控妻子，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扣留妻子的證件，扣留證件及護照就等於可以控制「大陸新娘」不離開家或臺灣，藉以控制「大陸新娘」的行動自由。如下面受訪者A說的：

那時在臺南的時候：「丈夫」就真的是吃喝嫖賭還有吸毒，他還有去勒戒，一年要勒戒兩次，但沒過多久又開始吸：工作，不要他做了，所以他就回臺北，我就說那分居一段時間，那時他也很精，把臺胞證、護照收起來了，我也帶不走孩子，所以就只有忍耐：（受訪者A）

這樣的控制方式並不見於受虐的臺灣婦女。這類的控制之所以可能與「大陸新娘」在臺灣「半公民」、「準公民」或「非公民」的身分狀態有關。

二、精神折磨

言語辱罵及精神折磨也是很常見的暴力形式之一，精神折磨雖不像肢體暴力有直接的傷痛，但因為可以是對任何事，其發生的頻率可以是相當高的，且其作用可以是累積、重覆出現的（當事人回想時就是重覆出現的一種）。前面提到的各種暴力形式，包括肢體暴力其實均有心理層面的作用，也都是精神折磨的一種表現方式。同樣地，七位受訪者也都遭受此種暴力，只是各個施暴者的表現方式不盡相同。

利用孩子控制「大陸新娘」

施暴者控制受暴者的方法之一是利用母職的天性，以孩子要脅她們繼續留下來，甚至威脅要傷害孩子來達到目的。

我先生希望孩子留在臺灣，到時候他可以要脅我，離不離婚無所謂，就可以控制我：（受訪者A）

我那時候不敢跑，因為他威脅我要先殺我，再殺孩子，我跑了他會殺孩子，我只好忍：（受訪者A）

以傷害小孩來折磨「大陸新娘」

受訪者D因為曾求助警察，警察告訴她

丈夫毆妻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因此他說「我又不犯法，我不打你，我折磨你」的話，以另一種較看不見的形式及容易迴避責任的方式施暴。我們前面提到威脅傷害小孩很容易對母親有所作用，這裡也是類似的方法，「打小孩」本身對母親就是一種嚴重的精神折磨。

我先生就說「我又不犯法，我不打你，我折磨你」。他會打小孩，小孩哭，他就說「你再哭看看」：孩子有什麼不好，他就說這都是拜你所賜：（受訪者D）

不合理的指控與歸咎

上述受訪者D的丈夫將孩子的行為表現或身體健康等所有責任都歸咎於他的妻子，傳達出他有絕對的權力來「定義」及「定罪」。面對這些無理的「指控」、「歸咎」，當事人會有「委屈」、「百口莫辯」、「低自尊與價值」的心理狀態，這也可視為是精神折磨的手段之一。

威脅

正如前面例子裡受訪者A提到，施虐者會威脅殺死受虐者來達到恫嚇的目的，讓受

虐者心生恐懼、擔心更嚴重的傷害而不敢反抗。下面受訪者F、G也提到類似的恐懼：

他說要把我燒成灰，骨灰盒子帶著跑：我先生說「我不怕吃牢飯，我不怕吃免費飯」，意思就是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包括殺人：（受訪者F）

他說，我要讓你活，活不成、死，死不了：你壞了我的好事，我就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你同意不同意啊：（受訪者G）

無理的要求

施暴者有時會對受暴者提出一些無理的要求，雖然這些要求可能不到違法的地步，可是正因為要求是「不合常理」的，要求受暴者做到才可以顯示施暴者手握權力的特質，及對受害者有精神折磨的實質效果。

我做生意都是一個人忙，一個人包水餃，包到很晚，還要整理屋子：吃完年夜飯，大家泡茶喝茶，我先生就說，走，去觀音山掃墓，我就說已經很晚了，他就說怕什麼，跟我走，不帶孩子，他姊姊就說無理的要求不要答應，不要理他，姊夫都生氣了，氣得拍桌子：姊姊說報警啊，他就說說話大聲一

點犯法嗎：後來還是算了：他就是找麻煩，小孩都被嚇哭了：後來他累了就睡了：我一個人收拾家裡，把孩子安頓好已經是早上五點了：才剛躺下去睡，五點十五分他又下來了，把門踹開，他不是敲門，是踹開，故意不讓你睡：然後就大吼大叫：然後就說你還裝睡，裝死啊，要死的話出去死：（受訪者D）

從這段話語中，施暴者有時會有一些異於常人的想法（如除夕去掃墓）並要受虐者遵循，以展示他的權力。另外，「踹門」等「不體諒人」的行為及言語中毫無對人的尊重都顯不出施虐者唯我獨尊的自我中心心態。

神經質地探問行蹤

施暴者常見的展現其控制的方法是想鉅細靡遺地了解受虐者的行蹤，做了什麼事、見了什麼人，並且會嚴詞逼問或用各種方式去了解，即使受虐者據實回答，施暴者有時仍會不信任對方。

他每次為了我的一些衣服啦！或是為了一些什麼東西他沒看過的，或是之前買的他沒看過的，他都要問清楚，他問哪裡買的？

多少錢？幾月幾號買的？比如以前我買那個儲值卡，他都要問。儲值卡是哪裡買？在那個地方買？哪家便利店買？都要跟他講清楚。哪天買？多少錢？都要講清楚。講清楚了，他還不信任，還要罵：（受訪者E）

而且都是他一個人講，我不能回嘴喔！就是說比如說他問一些什麼東西，我要回答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回答他就說我是在：就不行了，就可能要被打了，所以我不能吭聲，就是給他罵，就是一進門就罵，罵到他累了、高興了，罵到他高興了為止：（受訪者E）

從受訪者E這兩段話可以體會什麼是「精神折磨」，這裡，施暴者想掌握、控制妻子的行蹤等等，而且對妻子怎麼回答都不滿意，展現多疑、不信任人、自我中心的特質。第二段話語則顯示施虐者展現他才有發言權及主導權，受虐者只能照單全收、承受施虐者的對待。受訪者B有類似的遭遇：

我先生沒什麼缺點，就是年齡大，性格不一樣，好像就是有代溝，疑心病很重，我一出門他就會懷疑，所以我出門都小心翼翼

的，都要帶著兩個女兒一起出去，達到市場買菜也是，出去也是一個小時就回去。如果是我單獨出去回來他就會和我吵架，說我不要他。以前我去上班時他也會吵鬧、去查，去看我打卡打幾點：（受訪者B）

他會算我休幾天，有沒有超過八天，我出去都要帶著孩子，回去後他會問孩子去那裡？看到什麼人？有沒有看到男人？以前小孩會亂講，看到路人、不認識的人也講，現在比較不會亂講了：他就是很沒有安全感：（受訪者B）

受訪者B的丈夫對她每次出門的資訊皆想掌握，而且會用質問當事人、「查勤」、問小孩等方法來獲得資訊。長期下來，對受訪者B的確是一種精神折磨，而她也只能縮短在外時間、盡快回家來因應。

疑心病重

疑心病重是上述受訪者B、E提到對丈夫特質的描述，在婚姻暴力的脈絡中，施暴者很可能會因疑心而限制受虐者的行動，如強調妻子的行動需要徵得他的同意才可以，這也是一種控制的手段。

像我那個雇主也是啊！他動不動打電話去跟人家雇主吵架，他怎麼講？他說我叫我老婆去你那邊工作嗎？你叫我老婆我同意嗎？我有叫我老婆：「同意我老婆去你那邊工作嗎？」（受訪者E）

妳一定跟雇主喔：「一定有那個精神外遇，他說一定跟人家講的嘻嘻哈哈，不然的話怎麼會這樣？」（受訪者E）

他說我去工作了，我就查不到妳行蹤了，妳就搞什麼鬼我都不知道：（受訪者E）

受訪者E每次求職或就職後，丈夫會打電話去詢問雇主，有時甚至是質問，如上面第一段話語的情形，並強調自己同意的重要性，暗示他擁有妻子的監護權或行為的決定權。最後一段話受訪者的丈夫似乎把監控妻子的行為當做是比工作還重要的事來看待，擔心、不信任、懷疑似乎到了病態的地步。在受訪者B及E兩個例子裡，施暴者都提到疑心妻子有外遇，「大陸新娘」多是年輕、漂亮，妻子的外在條件好可能加深這些臺灣丈夫的不安全感，不過，無理的懷疑、指控仍然是暴力的形式之一，而且很可能是和丈夫

的不安全感、沒有自信有關，而非妻子美麗的外表所致。

四、破壞、毀壞物品

毀壞物品是施暴者表達自己憤怒的不當方法之一，毀壞物品蘊含的破壞力也會讓人心生恐懼，以下受訪者描述施暴者的毀壞物品的行為，其中有的造成相當大的損失，也展現施虐者異於常人的行為與心理狀態。

前兩天又吵架，先生把「做生意用的」車子砍爛，他一直跟我要錢，我說沒錢，他就說沒錢滾回大陸，什麼事都要聽他的，聽他的指示，我說你都不動怎麼會有錢，他不講道理的：（受訪者C）

昨天晚上我一個人去「做生意」，沒有電話，只有手機，他怕我會去和家暴中心連絡，就把我的手機砸壞，現在手機也不能用了：（受訪者C）

受訪者C的丈夫因為憤怒、不順他的意就把做生意用的推車砍壞，沒有考慮到可能影響生計的後果、心理狀態不似常人。「砍爛」

的破壞行為也會對目睹的人造成心理上的威嚇作用，以示破壞者的權力。毀壞手機是阻止妻子求助、讓她陷入孤立無援之境，施暴者也可能毀壞受害者視為重要的物品來表示其權力無所不在、且造成對受害人的實質上物品的剝奪及心理上的恐懼和「喪失感」。

「來臺灣」住鐵皮屋，十五天後他就一把火燒了：「不知道，和朋友吵架，就燒自己的房子：（受訪者D）」

受訪者D的丈夫甚至放火燒了自己的住宅，的確讓人有為所欲為的感覺，這種感覺會讓人害怕。

我上廁所：他拿刀子去廁所裡面要捅我，之後我就不動，他看我不動就沒有捅我，之後他就用刀子去割那個洗臉盆，咚、咚、咚，把那個刀子都弄得刀都朝背：「結果那個洗臉盆都弄壞了：（受訪者E）」

這個例子聽起來讓人感到施虐者的不正常，他出現類似精神病患的偏執的行為，這一點是更讓人感到恐懼的。從以上這些例子看來，毀壞物品是很值得注意的施暴者的行為。

五、押去抵債

受訪者D的丈夫常向人借錢，竟將妻子當做貨物般押去抵債。這個行為傳達出的意義是視妻子為丈夫個人的財產，丈夫可以隨個人的意思處置妻子。對妻子來說，這不只是精神虐待，更是去除個人的自主權及做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的權利。

但是後來等到生了女兒以後就變了，不關心家庭、沒有責任心；會動手、交的朋友都不是正常人，常常早出晚歸、出去玩，常常向人借錢，喝酒、欠錢不還；在大陸的時候還曾押我去抵債：：（受訪者D）

我在這一節主要展現了婚姻暴力的多元形式。人是獨立自主的個體，擁有對身體的自主權、自由意志與自尊。人與人間的關係與互動會加強或侵蝕、破壞人與人間的界限。婚姻暴力是人際間身體與心理界限的嚴重破壞，施虐者侵人人際底限並剝奪受虐者的身體、行為的自主性及心理安全。本節歸納的毆打、扣留證件、押去抵債的方式都是施虐者在主張對受虐者的身體主權、自由與

安全；精神折磨的各種方式、破壞物品等是施虐者剝奪受虐者的心理安全，造成其心理的恐懼、失落、無力感及無自尊。身體的傷害是可見的、可診斷的、有實際的痛感的；心理的傷害常反映在受虐者的失眠、憂鬱、低自尊、低自我價值等。婚姻暴力反映的是施虐者「控制」受虐者的行為本質，這可以透過施虐者的一言一行及多種形式展現出來；而控制之所以可能正顯示二人間權力的極度不平等。

肆、「大陸新娘」的求助歷程

「大陸新娘」的求助歷程與臺灣婦女相較，有其共通性也有其獨特性。七位受訪者剛開始受暴時，常因不知自己的權益、無求助資訊及缺乏支持系統而選擇忍耐，繼續待在受暴情境中，且有無助的感覺。一般認為，受虐的臺灣婦女求助過程中，娘家常扮演重要角色；在訪談的「大陸新娘」例子裡，娘家協助的角色有限，主要是因為娘家遠在大

陸、大陸人士來臺有相當多的規定，無法隨時隨意來去（如受訪者A、E）；「大陸新娘」怕丟臉（如受訪者C、F）；怕家人擔心（如受訪者B）；求助娘家無直接效果（如受訪者B、E）等考量讓許多「大陸新娘」並沒有求助娘家。有的娘家知道女兒受暴，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

七名「大陸新娘」求助的非正式資源有臺灣親戚、在臺老鄉及「大陸新娘」間的互助。求助行為的開始並不表示她們從此脫離暴力或丈夫的控制，其求助歷程常會有丈夫的反撲。如受訪者A談到她丈夫會到她求助的地方去哭鬧（包括警察局、婦保機構、境管局等），一方面可以看到這些施暴者「追蹤」的本事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受害者的求助行為也被他阻斷。受訪者F因為要搜證錄音，施暴者洞悉就有其對策，讓受訪者不僅再次陷入危機情境，搜證也沒有成功。這些是施暴者擴展其權力場域的例子，再次展現其控制的本質。「大陸新娘」資源少的特質、及某些行政、警政機關執行人員對「大陸新娘」的刻板印象等都可能讓丈夫的權力場域

向外延伸。

「大陸新娘」求助的正式系統第一個接觸的單位多為警察，再進入婦女保護機構。其中，受訪者A、B、D、F都提到求助警察的受挫經驗，有的警察以「大陸人士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而拒絕受理報案，有的較採臺灣丈夫一面之詞，有的把受虐者的行蹤透露給她的臺灣丈夫（施虐者），有的對受虐者（「大陸新娘」）置之不理，或在言詞間有意無意地歧視「大陸新娘」（註十一）。受訪者多是求助警察數次後，在施暴者的暴力狀況沒有好轉的情況下才會和婦女保護機構連絡，如打一一三專線或由警察轉介進入婦保機構。有的受訪者因為子女或身分證的考慮通常到了下一次嚴重暴力發生後才決定進住庇護中心。進住庇護中心後和個人單打獨鬥的求助方式很不相同，庇護中心從當事人的需求出發，在各方面協助當事人對受訪的「大陸新娘」是一個嶄新的經驗。受訪者均強調庇護中心的重要性與價值，讓她們身心有休息的地方。另外，受訪者B肯定中心提供的職訓轉介、團體輔導課程、個別諮商輔

導等，受訪者D提到中心協助其子女轉學，受訪者C提到寄養服務的介入，受訪者F特別肯定法律諮詢的功能。

除了婦保網絡的協助及社會福利機構提供的一般服務之外，受虐的「大陸新娘」有其特殊的需求。若「大陸新娘」在取得身分證前受暴求助，其關心的核心議題常是在臺灣的居留問題、身分證的取得、子女監護權及探視權等。現今大陸籍新娘的身分認定，是依中華民國國籍法的各項規定加以限制及規範。依國籍法第三、四條規定，「大陸新娘」需於我國領域內每年居住一八三日以上且居留的事實繼續五年以上方得申請本國居留權及國籍。而大陸配偶來臺定居每年有配額的限制，現行的配額是一年三六〇〇人。依此配額計算，有些人甚至需等上十年以上才可取得居留權；有鑑於此，行政院會於九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數額表」草案時，明定「等待配額超過四年者，且婚後累計在臺合法停留逾二年者，自明年起將自然取得來臺居留權利，不再受現行開放數額的限制」（中時電

子報二〇〇一／十二／十三）。而取得居留權後又需在臺連續居住兩年才能領到中華民國身分證。但如果在取得身分證之前，臺籍配偶死亡或因婚暴訴請離婚者，「大陸新娘」仍可能面對被強制遣返的命運。另外，因為取得居留權的同時也取得工作權，如果一位「大陸新娘」在未取得居留權前遭受婚姻暴力，若她選擇離開暴力家庭，馬上面對的就是無法就業的窘境，婚後育有子女者更會面對子女監護權的問題；即使離婚後獲得小孩的監護權，因無法合法工作，基本生活無力達成。對於未獲子女監護權者，因大陸人士來臺的嚴格規定，其子女探視權通常無法執行。

這些問題面向已將「大陸新娘」的需求及議題帶出目前社福系統提供的服務範圍之外。受訪者A談到的求助單位尚包括陸委會、境管局等，其核心問題正是居留延期問題。受訪者C表示可以體諒居留的各種規定是為防範假結婚，不過，繁複的規定對這些真正結婚且遭受家庭暴力的人是不公平的。受訪者G認為有關「大陸新娘」身分證的規定是給臺灣配偶創造了條件，以使他們可以

在婚姻關係中為所欲為。我們在討論受虐歷程時也提到許多臺灣丈夫正是利用這些規定來對「大陸新娘」進行「控制」，甚至對自己的暴行有恃無恐，對「大陸新娘」管制的各種居留規定似乎變成施虐者的幫凶。即使法令沒有問題，執行人員的態度、內部規定、對法令的詮釋與認知等還是有可能阻礙「大陸新娘」的求助之路。受訪者A提到她選擇訴訟離婚的方式來結束婚姻，她考慮帶孩子回到大陸等待離婚判決，因她持有保護令且獲得孩子的暫時監護權，但她去幫孩子辦護照時卻因她沒有身分證而無法申請；她若回大陸沒有丈夫的申請她也無法再到臺灣來，儘管法令的規定是二等親即可為其申請來臺，但境管局人員卻堅持一定要她丈夫的同意才行。從這裡可以看到執行人員有許多權力可以決定是否核可申請，這似乎扭曲了當初法律制定的周延性，更損及大陸新娘的權益。

伍、服務提供者對「大陸

新娘」的假設及其對服務提供的影響

我所訪談的七名受訪者對服務體系大致抱持正面、肯定與感謝的態度。但其中，我們也看到有些服務提供者（如警察）對「大陸新娘」有輕忽、甚至歧視的現象。我在對善牧基金會婦幼家園社工員的焦點團體分析中亦提到類似的情形，除了警察，尚包括法官及境管局人員（註十二）；而我也曾說明有的社工員在服務「大陸新娘」時曾出現「反轉移」的現象，質疑這些「大陸新娘」是不是值得幫助或適當的「案主」（註十三）。就如我在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一樣，這反映出一個重要的福利提供的主題，即這些服務的提供者在服務提供的過程中，對這些受虐的「大陸新娘」的態度仍不免受到我們社會文化中對「好女人」、「大陸新娘」、「兩岸婚姻」的印象與假設所影響。

常民對兩岸婚姻其實隱含著「鄙視」的心理，最主要的原因是認為「大陸新娘」嫁

給臺灣人是「經濟因素」的考量（註十四），是為了較好的物質享受。自由戀愛的擇偶歷程之所以被大多數的現代社會認可與推崇主要是因為現代人認為婚姻的基礎是「愛情」。兩岸婚姻的基於經濟考量顯然是違反「愛情是婚姻的基礎」這樣的前提；尤有甚者，媒體對「假結婚真打工」、「假結婚真賣淫」的報導亦時有所聞，「假」與「真」的對比使用，「假結婚真打工」傳達的負面道德評價、「假結婚真賣淫」隱射的「大陸新娘」的低賤，讓常民對兩岸婚姻的印象蒙上更深的陰影。因此兩岸婚姻在常民眼中一直未取得它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大陸新娘」也一直和「好女人」的形象相距甚遠。有關臺灣社會如何看待「大陸新娘」這一族群時，婚姻的基礎似乎變成評斷「大陸新娘」道德性的基礎。

撇除「假結婚」的情形而論（因為它牽涉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基礎），事實上，不只是愛情和安定的未來，經濟因素的考量在許多社會中（包含臺灣社會）一直是結婚的重要考量因素。人有追求較好的物質生活的本能。我的訪談所歸納的「大陸新娘」的擇偶

因素其實並不特別不同，特別的是我們對「兩岸婚姻」中經濟因素的強調及其中隱射的「大陸新娘」透過婚姻「不當獲利」的意涵。事實上，善牧基金會婦幼庇護中心的的社工員對她們曾服務過的「大陸新娘」的特質描述之一是「吃苦耐勞」（註十五），與一般人模糊範定的「大陸新娘來臺灣是為了物質享受」（強調「不勞而獲」）形象不相符。

另一個常見的對兩岸婚姻的假設是這些「大陸新娘」都很想來臺灣，並期待有很好的物質享受；而對其娘家多有「吸血鬼」、「要求臺灣人給各種禮物」、「攀龍附鳳」等印象。我前面的討論裡已證明這些並非「大陸新娘」的全貌，她們有更多元的面向，就像你我一樣；兩岸婚姻亦是。

人是道德性的動物，我們一直被教導，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成為一個合乎道德標準的人，如「好學生」、「好爸爸」、「好媽媽」等。我們在與人互動時，依情境及相互關係而定，我們會將對方歸類、視為某一種身分或類別（如「老師」與「家長」），並根據此類別的道德義務來評斷對方。以本文註一三

裡受訪者B描述的警察為例，他將受訪者B歸類為「大陸新娘」而非「家暴受害者」，所以警察責備受訪者B「為什麼要嫁來臺灣」而不是詢問她受到什麼不當的對待；而責備她「為什麼要嫁來臺灣」暗示她「自做自受」、「自食惡果」的評價，這又和該名警察對「大陸新娘來臺灣的目的」之假設有關，很可能，這名警察認為「大陸新娘」根本不該來臺灣或來臺灣為了較好的物質享受，因此即使她受到暴力對待也是罪有應得。換句話說，這位警察對「大陸新娘」有一既定假設，且視之為理所當然，並對眼前的這位「大陸新娘」進行道德的判斷。註十二提到的「會吵的女人就不是好東西」、在法庭上穿著光鮮亮麗或不是楚楚可憐者就「不像受虐婦女」，也都是對「好女人」、「受虐婦女」有一行為的既定假設才會如此說。道德義務常是我們行動、做決定、評價他人的重要面向，上述的警察、法官、境管局人員等的行為都是明顯的例子。

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之中，不免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我們的言語、行為、對他人的評價也在定義、複製或修正各種觀念與假

定。我在這裡已簡單說明「兩岸婚姻」、「大陸新娘」這些詞彙、範疇或類別如何被我們使用（或濫用），及這些模糊的、未被明說的、甚至有時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是如何可能地影響我們的行為，甚至是服務的提供。

身為一個社工員，我最關心的是「社工員」的服務提供。我在對善牧基金會婦幼家園社工員的焦點團體分析中曾指出有的社工員在服務「大陸新娘」的過程中，對「大陸新娘」爭取留在臺灣、爭取身分證、討好社工員、對自己要爭取的東西態度強悍、對別人或社會的幫助視為理所當然而本身不努力等行為與態度感到不認同、「很有情緒」等，這些都牽涉到社工員在對她服務的「大陸新娘」及「案主」進行道德判斷。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社會工作並不如我們所以為的只是一個理性（如案主主述、社工員診斷評估、處遇計畫的三階段的理性、標準化過程）、價值中立的活動；社會工作也是一個高度涉及道德判斷的活動（Taylor and White,2000）。上述的道德判斷不一定就是錯的、不好的，重要的是社工員

要知道自己何時、對什麼、以什麼基礎或假設在做道德評價，它是不是沒有問題的或沒有偏見的？社會工作也是一個發現事實的活動，我們是不是該相信「案主」的說法或「故事」？（最好的例子是近幾個月來，我們看到媒體對幾件女童性侵害案件的各種故事版本的報導，到底那一個才是真的？）社會工作因為牽涉到資源的公平分配與使用，有時甚至牽涉到人們的身心安全，因此社工員常需做決定（如是否給予補助？是否隔離孩童與家庭等）。在晚近現代社會中（有的學者甚至稱為後現代社會），社工員面臨的事件與價值常有高度複雜、不確定、模稜兩可（ambiguity）的特質，社會工作傳統的訓練似乎已不足夠。英國學者 Taylor and White（註十六）（2000,2001）提出她們的洞見。社工員的決定常是基於與「案主」的會談、與社工員間的討論、與不同機構間的討論而來，其中，「語言」是重要的媒介。語言學界、社會學界、人文學界、心理學界都已注意到「語言」的使用常是超乎其表面的意義之外，而研究日常生活中我們如何使

用語言來證明、捍衛自己的論點或達到我們的目的；這類研究可以統稱為「論述分析」。如果社工員能對自己、「案主」、各種合作機構使用的「語言」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協助我們做更好的評估和判斷。她們更進一步提出社工員應培養反思（reflexivity）的能力，包括對社工實務過程中的會談、討論、個案記錄、接受的理論與概念等都有批判分析的能力，能覺察自己和他人的語言策略、其中是否有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這些假設是不是沒有問題的，以協助自己進行評估和判斷。

陸、結論

本文分析七名「大陸新娘」的擇偶、受虐及求助歷程，企圖指出「大陸新娘」這一族群在婚姻暴力議題上的特殊之處。並以「大陸新娘」的受虐歷程為例，說明婚姻暴力的展現形式與本質。就本研究的訪談對象而論，「大陸新娘」的擇偶因素有強調經濟因

素、來臺灣生活、生活單純安定、亦不乏強調「愛情」因素者。「大陸新娘」的受虐經驗應以其擇偶過程、婚姻生活及社會文化差異為背景來理解，她們在婚前常易遭臺灣配偶誇大個人的條件或欺瞞重要資訊、不良習性，來臺後常易有受騙的感覺；因此二人間的權力遊戲在婚前即已開始。「大陸新娘」的遭受虐待是在一個陌生的社會文化環境，她們是被孤立的，缺乏非正式資源及求助資訊。她們受虐的經驗說明施虐者對受虐者身體自主權、心理安全及自尊的界限破壞；並顯示二者間權力的極度不平等。「大陸新娘」的受虐方式中，「扣留證件以限制自由」與其特殊的公民身分及規定有關；有的受虐者會受到「滾回大陸」之類的言語暴力。訪談的案例中多數呈現年輕、漂亮的大陸女性嫁給年長、外在條件較差的臺灣男性的現象，兩者間條件的差距似乎易為臺灣配偶不正當地防衛（即虐待「大陸新娘」）的藉口。「大陸新娘」的求助經驗顯示娘家的協助角色不大，非正式系統中以在臺的親戚、老鄉、同為「大陸新娘」者的協助較重要。正式系統

中「大陸新娘」第一個接觸的單位通常為警察，再進入婦女保護機構；其需求不只包括一般臺灣受虐婦女的身心安全與重建議題，尚包括居留、身分證取得、工作權、子女監護權與探視權行使等相關議題。這些不論在福利制度的設計上或服務的提供上皆有其意涵。

本文另以七名「大陸新娘」求助經驗為例，指出服務提供者對其服務對象有既定假設，且這些假設會不知不覺影響服務的提供；並建議社工員應培養論述分析及反思的能力去察覺這些既定假設對服務提供的影響，以能做出更適當的評估、判斷、處遇與決定。

〕本文為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接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的「大陸新娘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之研究」之部分（主要是第六章）改寫而成（計畫委託期間為二〇〇一・十一—二〇〇二・七）。本文之撰寫及發表感謝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湯靜蓮修女之同意。本文有關「大陸新娘」的資料主要是我所訪談的七

名「大陸新娘」（曾被安置或訪談當時正住在善牧基金會庇護中心的臺北市籍大陸新娘）之訪談資料，亦會用到下列資料：（一）善牧基金會自八十六年至九十一年二月廿八日止所安置的臺北市籍的大陸新娘（共計卅五位）的個案記錄分析；（二）針對善牧基金會婦幼家園社工員進行的二次焦點團體。有關這些資料詳見陳淑芬（二〇〇二）。〔

（本文作者為善牧基金會研究專員）

◎ 註釋：

註一：我同意「大陸新娘」一詞含貶抑性的意涵可參見趙彥寧，二〇〇二），及不論結婚多久均稱其為「新娘」的荒謬性。另外，我在「少數族群婦女權益探討研討會」發表「大陸新娘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之研究」時，蒙輔仁大學劉可屏教授指正該研究報告中使用「大陸新娘」一詞不夠嚴謹，似有概論所有「大陸新娘」之嫌；因此，本文撰寫時儘量避免類似問題。本文初稿並蒙輔仁大學王永慈老師建議以「大

陸配偶」一詞取代「大陸新娘」，我個人因考量「大陸配偶」一詞包含嫁給臺灣男性的大陸女性及娶臺灣女性的大陸男性兩者，而本文指涉的僅為前者，使用「大陸配偶」一詞似乎不夠達義。礙於其他替代詞彙的選擇不易，本文仍使用「大陸新娘」一詞，並均加以括號，以示此詞彙使用的問題。若此詞彙在本文的使用有其他問題與批評，應由本人負所有責任。

註二：我曾在「大陸新娘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之研究」的成果報告中提到「營造反歧視的社會環境」、「提升社工員對兩性議題的了解與自覺」及「注重差異、反歧視和反壓迫的實務工作」之建議，本文亦可作為這些建議的進一步說明或回應。

註三：很遺憾地，這一點似乎容易被社工員所忽視，我對善牧基金會婦幼庇護中心的「大陸新娘」個案記錄分析也得到類似的結果，詳見陳淑芬（二〇〇二）。不過，這可能正好表示常民對「大陸新娘的婚姻基礎」是有一些假設與認定的，所以「不需」有太多的詢問與探索。

註四：受訪者E說：當時也沒有想到說有那麼複雜。只認為說啊他在那邊薪水還蠻高的啊：當時就覺得他人：就喜歡他賺錢賺得蠻多的：經濟比較穩定啦！第二是他：很會追求啦！他花言巧語很厲害喔！：我們為了：也是有一段時間吵架，我就跑到X去，本來在X嘛！他就跑著去找，他就跟人家講說：我老婆跑到X來，你們那個地址是哪裡？能告訴我嗎？人家告訴他地址他就跑去找我，找完之後他叫我回來X，我不回，我又跑回X，就跑回就是我媽媽他們家，那時候還沒有要結婚嘛！他又跑到我娘家去。就是很會花言巧語的人，甚至跑去跟我媽保證說我以後再也不跟她吵架，我以後一定對她很好，還寫保證書：就是好像有時候很生氣就被他講到是：講到最後面會當場哭，妳也知道我那時候的工作，就是推銷嘛！跑到那地方：他就可以自己講到在那邊哭起來：他就是這樣的個性。很多人喔：就是說為了這個婚姻，為了這個感情會這樣做，我覺得蠻：就感覺說他蠻重情意的：

註五：詳見陳淑芬（二〇〇二：七八—七九）。
註六：受訪者A：會到臺灣是因為我大學畢業以後大概十月份就結婚了，然後我丈夫他告訴我，他要回臺灣奮鬥、打拼，所以一月份的時候，因為那時我是老師嘛，所以就在放寒假的時候到臺灣來，只是想來看看他的家人，沒想到沒過多久就懷孕了，那時我想既然懷孕了，那就請假「學校」吧，加上那時懷孕害喜很嚴重。這裡和我當時的想像完全不一樣，我想像的是在大陸工作，等拿到居留再過來臺灣，可是這樣一來提前很多：。
受訪者B：我剛結婚後住在大陸，並沒有想到來臺灣，第二個小孩出生後，因為大陸實施一胎化政策，生第二胎要罰款，一個要罰五萬多元臺幣。所以後來才到臺灣來：。
受訪者E：結婚之後就：呃：生老大才過來啦！之前我都不想過來，他也不想過來，我也不想過來。生完老大之後：就是要生的時候才過來：因為他說妳來到臺灣生，戶籍才在臺灣嘛！那妳不到臺灣生，

戶籍在大陸啊！

註七：受訪者D：以前感情好的時候，就想兩個人過正常生活，一起工作，他殺牛、賣牛肉，我做水餃生意，賣牛肉麵，可是他配合：我想得很美，一起工作就很開心：。

受訪者C：如果先生幫忙一點，一起做生意，一天可以賺個二〇〇〇元，二個人一起做，負擔房租、生活費什麼的就夠：。

受訪者F：努力賺錢，把他「丈夫」照顧好，一起走過人生的最後一段，我們子女都大了：。

受訪者G：就是對我好一點點，工作、錢無所謂，兩個人和和睦睦地，過個晚年生活：。

註八：受訪者E：沒想過要來臺灣的。我曾經想過是說他在大陸工作，有可能他在那邊賺錢，我們就可能在那邊過生活，有可能孩子也可能：我也是想說孩子有可能會自己帶。沒想到回來臺灣之後，他媽媽：就是這個家是他媽媽作主的，那我們的婚姻也好、孩子也好什麼的，都是他媽媽講

的算。那像我那時候生完老大，也是說把老大帶回大陸去，他媽媽就不願意：就不同意啊！那他兒子去工作什麼，也是他媽媽作主啊！

註九：受訪者D：想到到臺灣來，婆婆對我這樣：像菜我沒見過的都不敢問，南方北方的菜不一樣，有的沒見過，如果說不對了，婆婆就會：

註十：受訪者A：其實我覺得大環境的不同還是次要的，主要還是回到家裡，因為在臺灣接觸最多的還是臺灣丈夫，他們家很複雜，公婆是分居的，分居很多年了，所以跟婆婆住，這是很不能適應的，有時候婆婆會很大聲跟你講話，很沒修養沒教養，她不識字是文盲，在我們那邊來說是不可能的事，大家都是互相尊重，沒有婆婆就高人一等，媳婦就是下賤，這我很不能接受：婆婆開旅社，後來才知道不是正當的，真的很畸形，是叫妓女的那種，等於是個老鴇，我覺得很丟人，那時候跟他們出門，我會覺得丟人，層次很低，出門都穿拖鞋，冬天也不穿襪子不穿鞋，很不

體面，吃飯的時候還會搥腳，我一輩子也沒想到會和這樣的人生活在一起：

註十一：受訪者A：他大嫂在關鍵的時候也有幫過我，我第一次出來的時候，她幫我找住的地方，帶我去申請保護令，帶我去報案，可是警察很壞，跟我丈夫講：昨天你嫂子帶你老婆去申請保護令，現在去住在她【嫂子】娘家。搞的她現在不太敢幫我了，都會怕嘛。那些警察很差，還會說：老是來報案，煩死了。或是說保護令對我沒用，你不要申請

受訪者D：以前做生意別人會瞧不起，警察也是，以前有一個警察也是，我們只是要求公平而已，去領身分證的時候，他說「大陸來的啊？要問妳老公」。只有一個這樣，大部分的警察很得當，他們會教我老公，不能打，這樣是犯法，想別的辦法，我先生以前常被關，所以他會怕警察，可是去警察局幾次後他們都比較熟，我去報警，那些警察本來在泡茶、聊天的，一看到我來就不講了，通通跑去忙了，沒有人理我，真的很明顯，真是的覺得很無奈

受訪者B：警察也瞧不起我們，發生什麼事情就罵，真的是會氣死：那時和我先生的兒子吵架，管區的警察只聽他的，他就會說你為什麼要嫁來這邊，只聽他的，都不聽我講，去警察局報案，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混的，都沒調查，我去警察局好像沒見到我一樣，本來是幾個人一起在喝茶聊天，我一出現他們就散開，然後就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清官不理家務事啦，一個筆錄要做一個小時，做一個筆錄然後就去抽抽煙，回來問又問重覆的問題

受訪者F：警察不好，都很懶，地方的區公所、戶籍的「戶政事務所」，他說「沒想到你也是」他們對大陸新娘有歧視，有意無意的說「喔！又來了」、「可以回大陸了啦」

註十二：相關的陳述如警察認為「會吵的就不是好東西」、法官批評穿著鮮麗者不像虐待婦女、境管局人員認為「大陸新娘」就是來撈的等等。詳見陳淑芬（二〇〇二：六九—七一）。

註十三：請見陳淑芬（二〇〇二：六五—六

七)。另外，在社會福利界「案主」一詞的使用也越來越被認為是具有貶抑的意涵，如相對於社工員，「案主」意味是權力較低的、較無能力的、被幫助的一方等等（可參見如 Rojek,

Peacock and Collins, 1988）。

因此本文使用「案主」一詞亦加上括號。

註十四：這一點在我對社工員焦點團體的分析中亦有清楚地呈現

（參見陳淑芬二〇〇二：四二）。

註十五：請參見陳淑芬（二〇〇二：五二）。

註十六：此二人目前任教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亦是資深的社工實務工作者及社工員在職訓練講師。

◎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中時電子報（二〇〇一・二・二三C）推動

「面談機制」，防範假結婚。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c
ontent/newscontent/0,1058,1120011213000
03+110501+20011213,00.html](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c
ontent/newscontent/0,1058,1120011213000
03+110501+20011213,00.html)

周月清（一九九五）婚姻暴力——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置。臺北：巨流。

林佩瑾（一九九七）臺灣反婚姻暴力行動的研究——女性主義社會工作觀點的分析。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淑芬（二〇〇二）大陸新娘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之研究。論文發表於「少數族群婦女權益探討研討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主辦，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一日。

陳婷蕙（一九九七）婚姻暴力中受虐婦女對脫離受虐關係的因應行為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趙彥寧（二〇〇二）公民身分、國族主義與親密生活：以老榮民與大陸新娘的婚姻為研究案例。論文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二〇〇二年會。

11. 英文部分

Rojek, C., Peacock, G. and Collins, S. (1988) *Social Work and Received Ideas*.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C. and White, S. (2000) *Practising Reflexivity in Health and Welfare: Making Knowledg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and White, S. (2001) 'Knowledge, Truth and Reflexivity: The Problem of Judgement in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1): 37-59.